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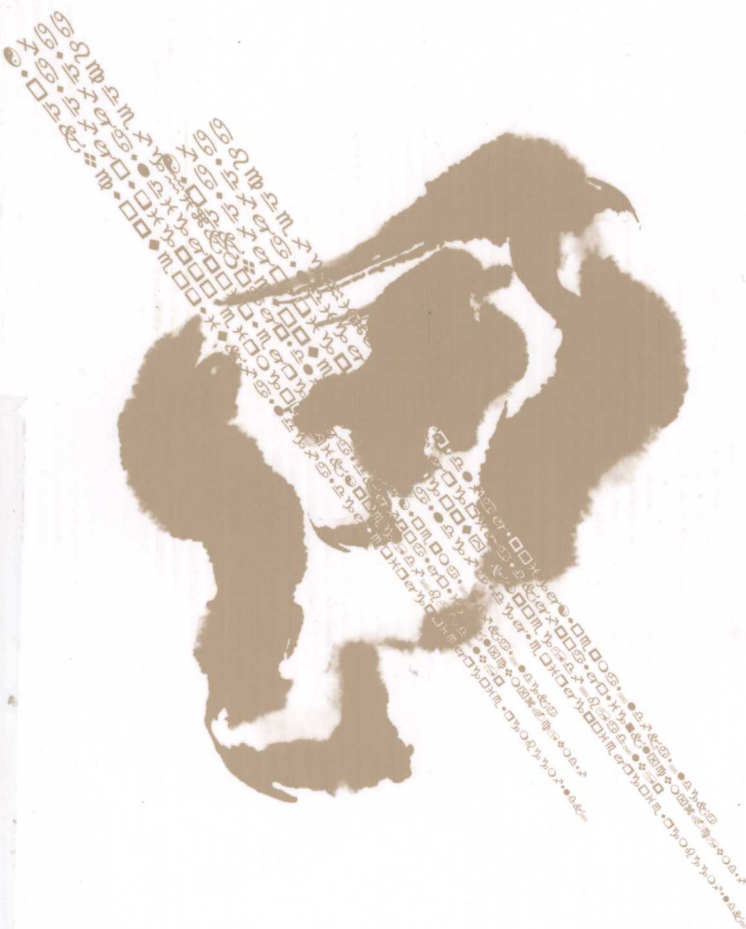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宏观经济研究系列

ZHONGGUO TONGHUO PENGZHANG CHENGYIN DE YANJIU
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

刘元春 等著



本书获得中国人民大学985、211项目资助

中国通
货膨
胀成
因的
研究
刘元
春等
著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ZHONG GUO JING JI WEN TI CONG SHU
宏观经济研究系列

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

ZHONGGUO TONGHUO PENGZHANG CHENGYIN DE YANJIU

刘元春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刘元春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宏观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7-300-09883-8

I. 中…
II. 刘…
III. 通货膨胀—成因—研究—中国
IV. 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007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宏观经济研究系列
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
刘元春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3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7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中国通货膨胀问题自 2006 年以来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围绕中国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目前通货膨胀形成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治理目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大量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论断和政策建议的差异之大，完全可以使政策实施者和社会旁观者眼花缭乱、满头雾水。因此，如何看待这次大争论，如何权衡这些判断和政策建议的差异，已成为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的派别

目前围绕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及其治理

方法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派：

一是货币数量派，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宋国青（2007）、周其仁（2008）、中国人民银行（2007；2008）等。在该派别看来，分析通货膨胀问题有一个颠覆不倒的真理，那就是新货币数量论创始人弗里德曼所宣传的一句话——任何通货膨胀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没有任何特殊性，在本质上就是货币发行过多了！治理该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他们还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不能归结为粮食价格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为粮食价格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因为只要货币发行过多，总需求出现膨胀，就会导致经济体对粮食和各种原材料需求的上升，最终引起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

二是其他需求拉动派，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张军（2007）、余永定（2007，2008）、社科院经济所（2008）、陈功（2008）等。在该派别看来，货币发行过多只是导致需求推动的一种因素而已，需求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的途径很多，主要体现在：1）由于人民币过分低估导致外需过旺，进而引发外需拉动型通货膨胀（余永定，2007；2008）；2）由于过度城市化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引发投资拉动型通货膨胀（陈功，2008）；3）由于人民消费升级导致粮食需求的上升，进而导致粮食价格主导型的通货膨胀（程建华，2008）；4）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导致总体性需求的上涨（社科院经济所，2008）。因此，该派认为治理目前的通货膨胀不仅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而且还必须通过本币大幅度升值、从紧的投资政策以及价格管制等措施进行总需求控制。



三是成本推动派，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李稻葵（2007，2008）、中金研究所（2007）、桑百川（2008）、顾书桂（2008）等。该派别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并不具备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而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供应短缺，引起各种成本急剧上涨，具体体现在：1) 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地租价格的上涨；2) 由于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和新合同法的出台，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3) 由于美元贬值、投机资本以及气候等原因导致各种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4) 由于节能环保政策的出台，导致环境成本的大幅度上升；5) 农业机会成本以及实际成本的上升导致粮食价格的上涨。因此，该学派认为，治理目前的通货膨胀不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的紧缩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反而会对经济体系带来过度的冲击，引起经济大幅度的下滑。因此，他们主张，中国相比需求管理而言，更重要的是进行供给管理，国家应当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减税、补贴等措施扩大企业成本消化的能力，同时利用财政政策和体制改革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其他瓶颈产业的供给。

四是结构性价格上涨派，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刘煜辉（2008）、姚景元（2008）、王敏（2008）、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7，2008）等。该派认为，目前价格上涨问题自2006年以来都具有结构性上涨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的上涨，这些特征超越了传统的“需求拉动—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分析框架，其产生的核心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 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即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导致大量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从而导致中国在制造业原材料以及相应的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制成品和贸

易品价格的相对调整；2) 中国经济改革在要素价格改革滞后的产物，要素价格管制的放松必定带来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密集使用部门的价格急剧上涨；3) 中国工业化、国际化以及城市化进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必然引起相应供求的相对变化，进而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治理这种结构性价格上涨就与治理一般通货膨胀的方法有本质的区别：1) 应当看到这些价格上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政府和各种经济主体应当适度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在中期范围内承受这些价格上涨；2) 应当从纠正中国经济长期性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出发，利用放松价格管制、减少税收、稳定汇率等措施，纠正目前价格体系中面临的各种扭曲，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根治价格上涨的隐患。

五是输入型通货膨胀派，其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李扬(2008)、祝宝良(2008)、刘元春(2008)等。该学派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全球都面临着结构性价格上涨的问题。中国经济在高度的国际化进程中，通过两种途径将大量的通货膨胀因素输入中国：1) 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国际流动性过剩输入中国；2) 国际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通过大量的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输入中国；3) 国际食品价格的上涨给中国食品价格带来了上涨的预期；4)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的涌入，使中国各种投机资本的投资资本价格上涨。因此，该派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在长期来看是一个国际经济货币的问题，需要全球经济合作；在短期和中期来看，中国需要改变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管理政策以及贸易政策，以改变目前过度失衡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应当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方式，减少对初级原材料进口的依赖。

上述五个派别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治理方法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数量派与结构性价格上涨派之间的观点采取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政策主张和政策措施。因此，如何求证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如何辨别这些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以及如何取舍这些派别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于认识和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十分重要的。而这需要我们对这些派别的理论基础以及实证计量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各派别的理论基础

货币数量派的理论基础就是新货币数量论。其奉为圭臬的就是弗里德曼所言的“任何通货膨胀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其理论主张就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必然是货币过多，治理的措施必定就是进行货币的紧缩。如何来理解弗里德曼的这句话呢？它是否足够支撑货币数量派的理论主张呢？应当说来，弗里德曼的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算得上经济学中的真理。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句话是弗里德曼说的，而是这句话在本质上是一句同义反复的话！通货膨胀是总体物价的上涨，而物价就是商品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反映为对应一定商品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但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意味着产生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的发行，或者说货币发行就必然是分析通货膨胀中最原始的外生变量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经济系统中的货币供给总量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量，它可以由货币当局的基础货币发行导

致，也可以由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引起。大多数成本引起的通货膨胀往往是在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量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流通中的货币增加的原因是成本支付引致经济主体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此时采取紧缩政策，可能就会打破正常流通秩序，导致经济出现加速性的衰退。因此，弗里德曼的话虽然正确，却不能成为货币数量派直接的理论基础。

其他需求派和成本推动派的理论基础十分简单，可以在一个“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中得到反映。在理论上总需求的几大组成部分及其决定因素、总供给的决定因素都是泾渭分明的。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却不是如此。其中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供求变化本身是相对的；二是供求往往是存在相互作用和互动的。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供求变化的因果关系和主次关系，不能把企业成本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归结为成本推动，也不能把总需求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归为需求拉动。例如，企业成本的上升往往来源于企业原材料的价格上升，来源于财务成本的上升，但导致这些上升的因素是总需求提高，导致对各种商品需求的提高，进而导致对商品投入的需求上升，最后显示为成本的上升，但这种成本的上升并不是供给因素导致的，在本质上不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再例如，投资名义规模的增加可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投资总量上涨，但也有可能是由于各种投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能来源于国际市场的变化，也可能来源于原材料受到外生因素冲击出现非经济系统性的短缺。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入分析现实的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才能运用“AD-AS”分析框架来进行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因素分析。这种动态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通货膨胀类型

的中间特征值，利用这些特征值为我们区分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

萨金特（1998）曾经给出一个分析框架，利用各种特征值来区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宏观经济可以概括为关于价格 p 、产出 Y 、就业 N 、利率 r 、消费 C 和投资 I 六个内生变量构成的系统，并可以从中得到如下形式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微分形式。^①

$$dY = \frac{F_N^2}{F_{NN}} \frac{d\omega}{\omega} - \frac{F_N^2}{F_{NN}} \frac{dp}{p} \quad (1)$$

$$\begin{aligned} dY & \left(1 - C_1 - I' \frac{q_N}{F_N} + \frac{C_2 + I' q_{r-\pi} m_Y}{m_r} \right) \\ & = -C_1 dT + dG - (C_2 + I' q_{r-\pi}) d\pi + \\ & \quad \frac{(C_2 + I' q_{r-\pi})}{m_r} \frac{dM}{p} - \frac{(C_2 + I' q_{r-\pi})}{m_r} \frac{M}{p^2} dp \quad (2) \end{aligned}$$

其中方程（1）表示总供给曲线，方程（2）表示总需求曲线， q 、 M 、 m 、 π 、 T 、 G 分别表示托宾 q 、名义货币、真实货币、预期通货膨胀、税收和政府支出。 C_1 和 C_2 分别表示消费对可支配收入和真实利率的偏导数； I' 表示投资对 q 的偏导数。在此框架中，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表现出不同的外在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工资的不同变化。一般而言，当发生外生的货币工资增加时总供给曲线将向上移动，一般而言，价格水平、实际工资和利率将上升；与此相反，就业、产出和实际利润将会下降。当发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时，总需求曲线将向上移动，从而使得产出、就业和价格水平上升，而同时

① 具体参见萨金特（1998）第 70~73 页。

实际工资却下降。2) 利润的不同变化。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 实际工资和利率都上升, 因而厂商真实利润将会下降; 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 总需求特别是货币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往往在通货膨胀初期会出现名义利润和实际利润的提高。当然, 如表 1 所示, 其他主要中间特征值也会发生变化。

表 1 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特征^①

	成本推动	需求拉动	
		财政扩张	货币扩张
真实工资	+	-	-
就业	-	+	+
产出	-	+	+
投资	-	-	+
名义利率	+	+	-
利润	-	-	+

如果深入分析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以及中间特征值, 我们会发现, 需求拉动派和成本推动派中很多论点是不成立的。中国企业利润的下滑可能成为需求拉动派别最为致命的反驳。而成本价格上涨原因的追溯却是成本推动派的致命伤。

结构性价格上涨派超越了“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 但其理论基础却不是正统经济学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因为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不同, 但工资增长速度却较为一致, 落后的向先进的看齐, 进而引发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目前所言的结

^① 其中“+”表示上升,“-”表示下降。



结构性价格上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 价格变动的结构性，即有些部门涨得快，有些部门涨得慢，有些部门价格反而下降了；2) 体制的变化或管制的放松；3) 结构性失衡，包括部门的偏向性增长和需求结构的失衡。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更多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具有更多的转型与政治经济特色，它企图从体制与经济结构来找寻宏观经济的答案。因此，在理论上比前几个派别要复杂得多，同时更富有中国特色，更能够解释目前部分价格上涨、部分价格绝对下跌的结构原因。但是，结构性价格派却存在难以给出统一分析框架和比较坚实的计量支持等问题。

输入型通货膨胀派没有独立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它与前面几个派别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它所强调的因素可以归并在其他派别的理论框架之中。只不过要将封闭体系的“AS-AD”模型扩展为开放的“AS-AD”模型，将封闭的结构主义模型扩展为开放的结构主义模型。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纯粹从理论基础的角度，我们难以完全判断各种派别的优劣及其正确性。不同的理论框架可能只是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的理论流派也许就是触摸大象不同部位的瞎子。因此，判断各个派别的研究性质还需要对具体的实证计量方法与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实证计量方法

关于通货膨胀形成原因以及治理方法的一般理论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常识性知识。但为何对中国近期的通货膨胀的看法差异如此巨大呢？除了对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解的不同，更为重要的反映为实证计量方法差异巨大。我们时常看

到,即使采取相同的理论框架,由于计量处理方法的差别,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刘霖、靳云汇(2005)应用协整分析和VAR方法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M2增长率以及贷款余额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朱慧明、张珏(2005)根据1994—2004年的季度数据发现中国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刘金全(2005)等以1981—2004年的数据研究得出M0、M1同比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又例如,对于通货膨胀是否是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由于采取的数据时段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具有很大的冲突。刘霖、靳云汇(2005)得出1978—2003年通货膨胀是一个I(1)过程;崔畅等(2005)得出不同阶段的数据具有平稳特征;张晓蓉等(2007)却得出中国通货膨胀既不是平稳过程,也不是一阶差分平稳过程,而是分数差分过程,是一个长期记忆性过程。导致这种冲突局面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理论原则的看法不同,而在于计量模型变量、数据以及计量方法的不同。因此详细研究不同文献的计量模型、采用的数据以及相应的方法,对于判断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研究通货膨胀成因的文献往往采取4大类计量方法:一是VAR方法和其他AR方法(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徐田江等,2007);二是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程建华等,2008;张军等,2007);三是利用联立方程为基础的GARCH方法(陈太明,2007;王凤云,2007);四是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ECM)(黄新飞、舒元,2007)。

VAR方法是目前研究中国通货膨胀运用最广泛的方法。



但是不同的 VAR 模型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关键原因在于目前研究者对于 VAR 模型的滥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 VAR 分析简单地套用在政策分析和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中，而忽视 VAR 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根据时间序列进行预测的方法。在 VAR 建模中，一个变量的值被表达为该变量和模型中全部变量的过去或滞后的一个线性函数。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联立方程，是泛理论的 (a-theoretic)，它不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存在联立方程式的理论联系和含义。因此，利用 VAR 主要是用于预测，一般不适合于政策分析。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分析主要是历史逻辑的回顾，不属于预测，利用 VAR 方法不能说明这些变量在历史过程中存在因果联系。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这个致命的问题，往往会在运用 VAR 方法之前建立通货膨胀的理论模型。例如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就将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理论分析的补充。但这种补救措施在本质上是多余的，因为大部分 VAR 模型中变量的选择是与理论模型没有实质关联的，VAR 模型是根据变量的数据特征来进行选择的。在众多研究中，数据的选择决定了 VAR 变量的选择，而 VAR 纳入变量的差异就决定了计量结果的差异。因此，计量得出的结论与研究者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基本是无关的。第二，对于 VAR 建模最大的挑战在于选择适当滞后长度，对于小样本，如果滞后期太少，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如果滞后长度较大将导致参数过多，带来消耗大量自由度的问题。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对于滞后期选择的约束，虽然我们可以利用 LR 统计量、赤池信息、施瓦茨准则等来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但很多核心变量的数据只

有季度数据或年度数据，从而制约我们对滞后阶数的选择，而这将严重影响计量的结果。另外，VAR 所有变量应当都是平稳的，否则必须变换数据，但由于模型是一个平稳与非平稳的混合体，变换数据将十分不容易。

自回归求积移动平均 (ARIMA) 模型基本原理是“让数据自己说话”，着重于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本身的概率与随机性，而不在意构造单一方程或联立方程，在本质上也是泛理论，与 VAR 的理论缺陷是一致的。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目前通货膨胀因素分析中运用得最多的另一种计量方法。例如，货币数量论之所以得出中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货币发行太多，其关键理由就是在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否就足以支撑这些派别的理论主张呢？答案不是十分肯定，因为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通货膨胀问题成因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 多变量问题，即很多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都与通货膨胀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并不是就说明了这些变量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同时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因为变量之间的关系、时间的设定以及数据的特性都可能使因果关系发生变异；2) 互为因果的判断问题，格兰杰检验结果往往是互为因果的，这种检验结果不能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提供支持；3) 不同因果检验方法的问题，即同一变量和数据，利用不同因果检验方法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例如利用 Toda-Yamamoto 长期因果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投资与价格的关系就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4) 数据与滞后期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兰杰因果分析中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回归中的滞后项个数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因果方向往往会因为所含滞后项个数的选择而发生变化。例如货币与通货膨胀、收入工资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中不同标准选择的最优滞后期往往会颠倒这些因果关系，使因成为果。因此，很多专家都建议滞后期数字多勿少。但中国通货膨胀和相关变量的数据有十分强烈的期限约束，因此，简单利用这些数据和指定的滞后期所反映的因果关系可能在计量上是不真实的。

协整方法、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反映函数也被通货膨胀研究广泛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建立在稳定经济系统中各种变量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假设基础上。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并非一个长期稳定的系统，通货膨胀和很多参数之间存在着很多阶段性的变异关系。例如在利率管制不同的阶段中，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同的。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与21世纪的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有本质的差别。如果局限于某个时段的分析，这些计量技术又会面临小样本导致的偏倚问题。特别是分析近期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时，如果简单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或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进行计量，得出的结论势必与中国经济近期形成机制的巨大变化难以吻合。

四、一些结论和本书写作的说明

通过前面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 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解一方面需要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分析框架，但另一方面却需要跳出经典分析框架的约束，从中国经济的特性中寻找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拿来主义

是中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中派别林立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研究面临的最大的理论陷阱。

(2) 单纯的通货膨胀成因的计量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计量方法上都是难以胜任的，计量方法的滥用以及计量分析与理论分析的严重脱离是导致目前各种派别林立的另一个核心原因和困境。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出发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企图寻找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基础和统一的分析框架；二是在计量方法上进行不同的尝试，以对比不同研究方法导致的不同结论。写作分工如下：前言（刘元春），第1章（刘元春、钱宗鑫），第2章（刘元春、金山），第3章（刘元春、阎文涛），第4章（王晋斌、李南），第5章（范志勇），第6章（夏明），第7章（章艳红），第8章（夏明），第9章（丁守海），第10章（丁守海），第11章（郭杰、周晓慧、杨杰），第12章（刘元春、沈俊杰），第13章（刘元春、邵坚玲），附录1（郑超愚），附录2（刘元春），附录3（顾海兵、刘玮），附录4（刘元春、阎文涛）。

应当说，本书研究成果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它是我们研究团队深入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开始。

参考文献

陈大明. 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 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 (12)

陈功.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载第一财经日报, 2008-05-08

程建华等. 我国物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载统计研究, 2008 (1)

顾书桂. 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地租推动型. 载经济学家, 2008 (3)